

# 人性的 A 面和 B 面

30年前，台湾学者蒋勋在旧金山机场第一次见到丁玲，“头发全白，满脸皱纹，像农村老太太，穿着布衣布鞋，茫然地站在那里。”后来蒋勋和丁玲去芝加哥最高的楼顶，一屋子貂皮女，抽烟，时髦而颓废，丁玲很平静地用肘子捅蒋勋：“当年我在上海就是这样。”

人是会变脸的。丁玲24岁就写性解放，甚至写“女同”，旖旎情史也不少，后来时而右倾，时而左倾，新潮过，张扬过，跟风过，老来终于想通透了，跟她的宿敌周扬一样。

许多年里，我只知道赫鲁晓夫是一个在联大会议上用皮鞋敲桌子的莽夫，后来知道了他在斯大林死后3年便挫骨扬灰，抖露出无数血腥往事，而此前20年，他又曾是斯大林路线的鼓吹者和执行者，单是在一份文件里就圈定了8500个死刑名单。至于著名酷吏贝利亚，固然满手鲜血，但却是斯大林死后破除个人崇拜、实施平反运动的第一人，他推行的改革措施甚至比赫鲁晓夫更早更激进。在不同的时光里，老虎是可以念佛的，而念佛的可以杀人。

所谓屁股决定脑袋，大抵没错。当年我

听某同事聊起其大学师兄，在校时温润可人，热情和善，后来一头扎入官场，遂成跋扈小吏，变化之快令人侧目。此人曾眼光凌厉地对我说：汝可知知是脖子硬还是刀硬？

据说年少时激进的，老来必保守顽固，康有为和李敖都是例证。我年轻时顽劣散漫，人到中年却变得枯燥严谨，似乎也正在印证这一定律。将来我努力跟紧时代潮流，不让自己变得那么面目可憎。

最近在微博上看到许知远的一句话，大意是某些曾经傲骨的文人忽然趋炎附势起来，其实一点都不惊奇。人性里边永远有A面和B面，或因时间更改，或因境遇更改，或因某一时期的春风秋雨触动而更改，总不是固定的。

《无间道》导演麦兆辉说，他幼时住警察大院，踢皮球时吵醒了更的夜班警察，警察黑着脸提着菜刀走来，抢走了皮球，3分钟后又把皮球捧回来，可那球已经碎尸成两半。

我们在这世间，脸在变，身在变，心在变。变节不需要理由。段祺瑞下野后，在天津做吃素寓公，整天昧着眼睛念佛敲木鱼，眼看着舍利子都要长出来了，忽然孙中山邀他一起倒直，他立马丢掉佛珠重返政坛。

(摘自《春城晚报》刘原/文)

## 新锐短评

### 让尊严免于“被冻伤”

11月30日中午，一农民工在郑州郑汴路立交桥下躺了20多天后离世。周围民众称，他是病死或被冻死。在此期间，120和救助站被曝见而未救。这起悲剧，因多重凄冷元素的叠加，而刺痛人心。也许它只是个案，可一个民工的非正常死亡，是解剖底层群体生存、社会救济等的微观切口。体面而有尊严地活着，生命之花才不至于凋零。而死于病患或饥寒，却在剥落“尊严”的内核。也只有延伸关怀触角，从长效保障、临时救济等多维度去完善，才能让每份尊严都柔软舒展，免于“被冻伤”的风险。

(摘自《长江商报》12.3 余宗明/文)

### 有多少猕猴被“公务消费”

央视记者日前在江西省资溪县采访时发现，有三名盗猎者在国有林场猎杀国家重点保护动物猕猴，林区管理人员竟无人出面阻止。当地一些餐馆、酒楼，也偷偷宰杀和出售猕猴。一家叫“珍味农家乐”的餐厅挂着抚州市公务消费定点商家的牌子，据介绍，这个牌子是当地三公消费办公室颁发的。类似的消费野生动物，在很多地方其实早已存在，并成为官场上尽人皆知的秘密。有多少猕猴成为公务消费的盘中餐？只要这类消费行为存在，则杀害将不绝如缕。而治理消费，首要的就是约束公权力，不使公务消费猕猴等野生动物的行为再度发生。

(摘自《中国青年报》11.29 胡印斌/文)

### “陈冠希广告”不能只为“眼球”

近日，上海地铁里出现一则“艳照门”主角陈冠希代言的某租车公司五年的广告，“寻开心，0开销”这种暗示性的广告语让不少乘客“难以接受”。“艳照门”主角陈冠希名声不佳，可是有些商家却剑走偏锋，让这样的问题艺人做代言。而广告的制作和设计者无疑是始作俑者，他们把低俗当卖点恶炒。陈冠希的地铁广告是撤了，可是监管部门的“滞后”，说明相关部门只有管理而没有之前的监督。因此，应该进一步强化广告审查，同时对于违规投放的广告制作商予以严厉惩罚，别让公众受到一些“无良”广告时不时的骚扰。

(摘自《新京报》12.3 马龙华/文)

## “卖官”的境界

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看，“卖官”是有境界之分的。今日“卖官书记”们的做法，公器私卖，可视为黑道私企的黑市交易；而古人的“捐纳”则无疑属于国营大厂的公开拍卖。这是最广为人知的两种“卖”法了。

客观地说，倘若官职横竖都是卖，那么公开卖无疑是交易成本最低、交易风险最小的一种方式了。比起黑市交易，它起码标价童叟无欺，好处多多——卖方可以免除被绳之以法的恐惧；买方不必绞尽脑汁揣测行情，不必担心“暗标”失败血本无归；其他人也可不必继续

“默默奉献等提拔”，只需抬头瞄一眼价格表，再摸摸腰包便可明白，是举牌竞标，还是低头认命；即使皇帝，也有好处，至少卖官收入不至于完全被各级官员私吞了去。

除了上述两种现金交易，实践中还有另一种广受赞誉的“官职买卖法”，不妨称之为全民共营、期货交易——每一项乌纱帽都由辖区内全体民众共同“拍卖”，竞购者除了不能直接用现金之外，许多东西都可

(摘自《杂文月刊》2012年12月上 林永芳/文)

## 当年轻人成为“笼中鸟”

前几天参加一个80后、90后年轻人的文化心理的讲座，这让我想到严复先生译著《天演论》里的一句名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诠释了什么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一只虎皮鹦鹉飞出笼子逃走了。能够重新获得自由本是件好事，但是十多天后，人们在森林里发现了它的尸体，在果实累累的林子里竟会有鸟饿死！用看林老人的话讲：“家养的鸟儿，用不着找食找喝，慢慢地会失去寻食的本领，一旦飞出笼子，难免饿死。”

究竟是什么原因，把80后、90后变成了心理上的“弱势群体”和事实上的权利被剥夺者，利益上的被损害者？事实上，从家庭环境开始，这种心理上的弱化、权利的被剥夺，就已经被长辈们以爱的名义被剥夺了。许多家庭，正是把自家孩子当做笼中的“虎皮鹦鹉”，他们倾尽全力经营着“鸟笼”，让自家的“独鸟”不知饿馁，不经风雨。

而体制化、规模化、机械化的教育，更是进一步磨灭着孩子们的个性，他们是名副其实的学舌鹦鹉，只被允许复读现成的答案，自主思考的权利被剥夺，一切对现实的叛逆和挑战都会受到惩罚：只是在网上转发了几个老家伙的言论，大学生村官就被投进了劳教所；多少在现实中失去了话语权的青年选择在网络上体验那点可怜的说话的自由，却又承受着“被跨省”的恐慌。

如此三十年下来，“笼式教育”教化出的青年们，很自然地把“适者生存”理解成了对“笼中法则”的顺从，越是这种教育体系下的优秀者，就越是处处显示

(摘自《南都周刊》2012年第46期 马志海/文)

## 一首有代表性的山西民歌

“交城的山来交城的水，不洗那个交城它洗了文水；灰毛驴上山灰毛驴下，一辈老子也没啦坐过那好车马；交城的大山里没啦那好茶饭，只有莜面栲栳栳还有那山药蛋；狠心的爹来没主意的妈，怎把奴家打发在那山旮旯。”这是一首流传在山西交城、文水一带的民歌，起源不晚于清代，悲凉旋律十分动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山西籍歌唱家郭兰英演唱了其中前三节，使它成为山西民歌最有代表性的曲目之一。我上世纪60年代末到山西插队，就经常听到这首歌的传唱。

### 重新填词变颂歌

到了1976年10月6日，王、张、江、姚被捕，华国锋当选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他家乡的这首歌很快被地方的文艺工作者重新填词，成了一首全国反复演唱的颂歌：“交城的山来交城的水，交城的山水实呀实在美。交城的大山里住过咱游击队，游击队里有咱的华政委。华政委最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引路他紧跟。华主席为咱除四害，锦绣的那个前程放光辉。”

习惯了陕北民歌改编成《东方红》的中国百姓，很快也接受了山西民歌改编的《交城山》。直到两年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华国锋同志在会上着重强调了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集体领导。他提议，全国报刊宣传和文艺作品要多歌颂工农兵群众，多歌颂党和老一辈革命家，少宣传个人。全会完全同意并高度评价华国锋同志的提议，认为这是党内民主生活健全化的重要标志。”这首歌的传

播才逐步降温。后来华国锋退出领导岗位，

### 那曲

《交城山》也回归了原来的民歌版。

### 纪登奎拒绝批准传唱

公众有所不知的是，在这期间，以改编民歌的方式颂扬华国锋，在中央高层有过不同的意见。今年，我采访过经济学家纪登奎先生，他回忆了父亲纪登奎的一些往事：

中央宣传口的工作，原来是姚文元分管。粉碎“四人帮”以后，改由中央政治局委员纪登奎分管。因为纪登奎宣传，给他送来一首歌，就是“交城的山交城的水，交城出了个华政委”那一首，词曲都有了，就等他批了。只要他一批示，中央乐团、歌舞团演奏，广播电台、电视台播出，就会在全国传开了。这首歌送来以后，纪登奎没有批。过了几天，汪东兴来了，批评他“宣传华主席不力”。可是，对这首歌，纪登奎还是没有批。又过了几天，电话通知，中央要找他谈话。纪登奎去了以后，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都在，对他说话很简单，只有几句：中央的分工，做一点调整。宣传口，原来姚文元管，现在登奎同志管，以后交给汪东兴管。几天以后，中央又找他谈话，还是调整分工，中央组织部，原来一直是纪登奎管的，也交给汪东兴了。这是粉碎“四人帮”以后一个月的事；其中，宣传口从接管到交出，纪登奎查过工作日志，一共27天。

在政治局会议上，纪登奎还发言表达过这样的意见：中央宣传口的工作，原来是姚文元分管。粉碎“四人帮”以后，改由中央政治局委员纪登奎分管。因为纪登奎宣传，给他送来一首歌，就是“交城的山交城的水，交城出了个华政委”那一首，词曲都有了，就等他批了。只要他一批示，中央乐团、歌舞团演奏，广播电台、电视台播出，就会在全国传开了。这首歌送来以后，纪登奎没有批。过了几天，汪东兴来了，批评他“宣传华主席不力”。可是，对这首歌，纪登奎还是没有批。又过了几天，电话通知，中央要找他谈话。纪登奎去了以后，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都在，对他说话很简单，只有几句：中央的分工，做一点调整。宣传口，原来姚文元管，现在登奎同志管，以后交给汪东兴管。几天以后，中央又找他谈话，还是调整分工，中央组织部，原来一直是纪登奎管的，也交给汪东兴了。这是粉碎“四人帮”以后一个月的事；其中，宣传口从接管到交出，纪登奎查过工作日志，一共27天。

在政治局会议上，纪登奎还发言表达过这样的意见：



现在，我们把毛主席和毛主席平列起来，伟大领袖毛主席，英明领袖华主席，这样的做法，好不好？还是毛主席讲的道理嘛，领袖的威信，是在斗争中建立起来的，靠人为的大树特树，归根到底是不行的。粉碎“四人帮”以后，新的党中央，我们这些人，还是多做工作，把国家和人民的事情办好，在工作中实践斗争中建立威信，这样才好。搞大树特树，那一套办法不好。

此后，纪登奎在中央只管国务院的事，分管农业等方面的工作，直到十一届五中全会辞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职务。

八十年代，纪登奎退下来以后，和纪登奎闲谈，说起过不赞成新编《交城山》那首歌的具体想法：“交城的山交城的水，交城出了个华政委”，这首歌不能唱啊。你那个华政委，是个什么政委啊？是个县大队的政委嘛，一共只有十八个兵。问题是，你华政委领导十八个兵的时候，共产党的军队里，不说那些元帅、大将了，就是肖华、杨成武、陈锡联这些人，也都是指挥千军万马的将领了，这样的人已经有一大群了呀，这些人可都还活着哪。我在军队里干过几年，和‘老总’们在一起‘混’过，和他们还比较熟悉。领导十八个兵，就那么唱，你让那些‘老总’们听了，心里是个什么滋味儿？这首歌，对华主席在军队里的影响实际上并不好，我这是为他考虑嘛。”

(摘自《文史参考》第22期 丁东/文)

## “文革”笑话：审讯者常因失言成罪犯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江青、谢富治等规定，审讯人员在审讯当中，审讯者与被审讯者都不得有一言一语一句一字，损伤到他们的那个“无产阶级司令部”——“中央文革”的成员陈、康、江、王、关、戚等。否则，就要同样问罪。这个荒唐的规定，闹出了许多笑话。有的审讯人员，昨夜还在审讯别人，由于一句问话被他认作不当，或者对被审讯者的所谓“攻击言论”疏于“立刻猛烈回击”，第二天就变成了“利用审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大政治罪犯，其中有人因此而被关押好多年的。

正因为如此，有的人甚至不敢临审。特别是1976年天安门运动前后，他们捕了三百多人。那些青年是公开反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们祸国殃民的罪行的。

一到审讯时，被审讯者开口就是骂江、张、姚、王、康生之

流，审讯人员耳朵里灌满了骂他们的“首长”的言论。因此，当时的审讯室，除了被审讯者的痛骂，就是审讯者自

我表白的反击：“你反动！”“你污蔑！”“你造谣！”要不就是拳打脚踢鞭响，还有谁敢接触所谓案情的内容呢！“你诬蔑中央首长！”“你诋毁无产阶级司令部！”“你罪大恶极！”“你死有余辜！”这么一来一往的对骂，一句一句地紧跟，相互交织，弥漫在审讯室的空气中。书记员记了许久，下来只能哭丧着脸向“领导”诉苦说：“这，这这，怎么能作为材料呢！”“领导”只能难堪地说：“压下吧，可不能毁掉，查起来要负责的！”

(摘自《从“童怀周”到审江青》汪文风/著)

(作者为当年审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件办公室副主任兼审讯组长)

**那年**



## 残雪：把生活变成艺术

功夫不负有心人。6个月之后，我们用铝板做了个小招牌吊在窗户下面(当时住三楼)，开始正式承接服装了。我记得第二个月就赚了60多万元，合丈夫两个月的工资。此后当然越做越大。丈夫的裁剪技术与众不同，很受欢迎，我则比较擅长于为顾客设计合体的式样。最为繁荣的期间，我们在家里带了4个徒弟一起干。我们在门上安了那种最原始的电铃，顾客一按，它就发出如鸭公一样的怪叫。在我看来，这噪音是世上最美好的音乐，它代表了自由、希望和心境的平和。

我的处女作《黄泥街》的创作，就是在这样喧闹的环境中开始的。那大约是承接服装不到一年之际，我的自信心空前高涨，前途闪闪发光。白天忙忙碌碌，人来人往，一边脑袋里塞满了衣服尺寸，我就用另一边脑袋创作。我见缝插针地

解决问题。当时我对理想职业的考虑是这样的：我希望找到一种职业，能够免去种种令我感到恐怖的人际关系，尤其是能免去政治学习。这种职业也许赚钱很少，但责任心不大。那是1981—1982年，我找不到这样的工作。我曾盼望去省政协做烧开水的勤杂工，但等来等去终于没能轮到我。

有一天，我在走投无路之际脑子里冒出了一个念头：学缝纫。对，为什么我不能学呢？这是一门可以解决生活费用的手艺，只要有恒心，我不信我就学不会。退一步来说，即算我最终没能学会，也可以帮人补补衣服，锁锁线边什么的，我看见过的妇女就是以此为生。

接着我又想到我的丈夫，他是一个优秀的木工，做木模家具是看图纸划线，做服装不也是同样道理吗？正好家中有台缝纫机，我马上动手拆旧衣服，拆完再缝上，反复反复地练习。在我的带动之下，丈夫也开始钻研裁剪。当时他在一个仓库搞维修工作，那是种“磨洋工”的工作，没事干领导也不让回家。所以他白天干完活都在维修房关上门打瞌睡，晚上回来用报纸裁纸片。

对未来的憧憬激励着我：成为自食其力的小业主，万事不求人，不找关系，凭手艺过日子，与此同时获取搞艺术创作的条件。缝纫不是一门容易学的手艺，既需要韧性又需要灵性。我记得有多少个夜晚，我们为了攻克难关，一直工作到凌晨三、四点；还有一次因遇上难题，竟连3岁儿子吃饭的事都忘了，为此自责得夜间失眠……其中的艰辛自不必细说。

1985年至1987年，我开始“退居二线”，将缝纫工作全盘交给丈夫去处理，自己只煮煮饭，管管儿子。

1986年至1988年，我发表了大量的作品，在文坛上造成了影响。至此写作已成了我的目的。

(残雪，湖南先锋派文学代表人物，代表作《山上的小屋》、《苍老的浮云》等)

(摘自《写书记》残雪/文)